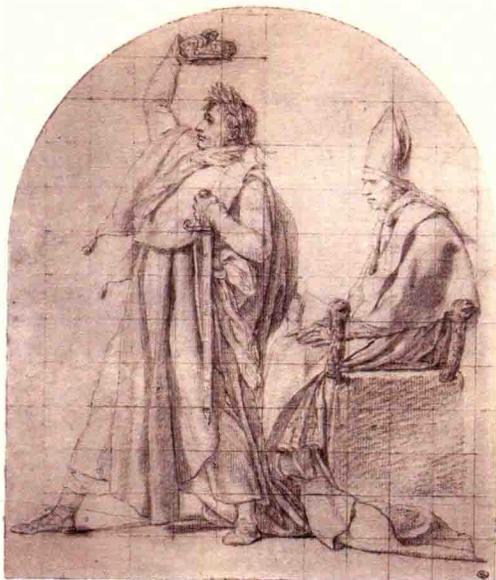


拿破仑大奖获得者力作

对伟人前半生的批判性还原



成为拿破仑

NAPOLEON: SOLDIER OF DESTINY

[英] 迈克尔·布罗厄斯 (Michael Broers) 著

李海 刘洋 韦乔钟 译

曾荣登英国亚马逊“拿破仑战争史类”“法国人物传记类”“法国历史类”榜单前三

根据巴黎拿破仑基金会的《拿破仑书信全集》写就
一本充分立足于拿破仑真实想法的传记作品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Michael Broers

NAPOLEON:
SOLDIER OF DESTINY

成为拿破仑

[英] 迈克尔·布罗厄斯 (Michael Broers) 著

李海 刘洋 韦乔钟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为拿破仑 / (英) 迈克尔·布罗厄斯(Michael Broers) 著; 李海, 刘洋, 韦乔钟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680-2533-1

I. ①成… II. ①迈… ②李… ③刘… ④韦… III. ①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传记 IV. ①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909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7-067号

NAPOLEON: SOLDIER OF DESTINY by MICHAEL BROERS

Copyright © 2014 BY MICHAEL BRO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HUS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成为拿破仑

[英] 迈克尔·布罗厄斯 (Michael Broers) 著

Chengwei Napolun

李海 刘洋 韦乔钟 译

总策划: 亢博剑 彦吴桐

责任编辑: 张 丛

特约编辑: 王绍政 范少鹏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责任校对: 刘 竣

责任监印: 朱 玟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吉姆·麦克米伦



目录

- 001 引言 命运的力量 自由、平等、雄心
- 015 第一章 边缘处的生活 科西嘉摇篮，1769—1779 年
- 阿雅克肖：殖民世界
启蒙运动及革命时期的科西嘉
- 043 第二章 法国：危险之地 从陌路人到救星，1779—1797 年
- 法国大革命：一切的终结，1789—1793 年
难民们
土伦包围战
另一个法国：克拉里家
破灭的田园生活梦：生存政治学，1794—1795 年
1795—1796 年：人生地图上的最低谷

- 109 **第三章 征服意大利** 新星的诞生，1796—1797 年
- 发生于意大利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大后方”：意大利人的叛乱
蒙贝洛宫：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交汇处
- 143 **第四章 奇萨尔皮尼共和国** 掌权者的学徒期和一个未引起注意的警告
- 161 **第五章 更广泛的教训** 妄自尊大，1797—1800 年
- 埃及的统治者
叙利亚之战
- 199 **第六章 不祥之雾** 夺权：1799 年秋，雾月政变
- 从被驱逐者到最高统治者：掌权之路
- 225 **第七章 当政的危险** 刺客的阴影下，1800—1802 年
- 再次策马扬鞭：第二次意大利战役
对欧洲实施绥靖政策
“狩猎期”
《亚眠和约》：转折点
- 263 **第八章 掌权** 走向政治的终结，1802—1804 年
- “走出丛林”：从恐惧到信心
包容的局限，1802—1804 年：镇压右翼势力
政治现实：接受中间派
终身执政，《共和十年宪法》：权力稳固

- 291 **第九章 伟大的改革** 新政权的权力之源，1800—1804 年
- 新国家的出现
 另一场战争：内部平定叛乱和镇压策略
 社会根基的稳固：重组公共财政
 针对未来的政策：公共教育的重塑
 关于过去的政治：政教协定及调解右翼的失败
 《民法典》
- 339 **第十章 阳光灿烂** 信心与挫折，1802—1804 年
- 西欧：新帝国轮廓的逐渐浮现
 英国人：与聋子的对话
 新世界的坟墓：一个帝国的终结
 英法深渊
- 373 **第十一章 走向帝国** 心照不宣的野心，1802—1804 年
- 黄金时代
 绝对权力
- 403 **第十二章 与英国的战争** 拿破仑大军的诞生及法国海军的覆灭
- 征服英格兰
- 421 **第十三章 杰作的诞生** 布洛涅军营，1803—1805 年
- 449 **第十四章 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 大战的临近，1803—1805 年

485 尾声 冒险之举：1805 年秋

489 致谢

493 注释

537 主要专有名词对译表

引言 命运的力量



自由、平等、雄心

不，我的伯爵大人，你不会得到她……你绝不会得到她。因为你是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贵族老爷，你觉得自己就是个了不起的天才！……门第、财富、军衔、官位，你以为你有了这些就可以如此不可一世吗？你究竟做出过什么贡献，可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你除了从娘胎里出来时使过劲儿，你还做过什么更了不起的事？即使如此，你也不过是一介凡胎而已。而至于我，该死的！我只能鬼混在普通人中，为了生存而苟延残喘……而现在，你居然还要和我决斗！¹

尚且值得欣慰的是……我能以他的名义履行自己的职责……冒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因此我理所应当从他那里得到回报，而不是像我最后所得到的那样……他这个人完全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所有函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只会不断地催促我，要我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他在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扔下大部分其他函件，不加签署……所有函件必须有人签署，所以只好由

我来签了……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苛待，我都一一忍下来了……
但是，当我发现自己战战兢兢地为他工作，他却故意要剥夺我所应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再忍耐下去了。²

上述第一段引文出自亚历山大·德·博马舍1781年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该剧实为加隆·德·博马舍所作，原文疑有误——译者注）中费加罗的独白。费加罗为人十分聪明而又狡猾，但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为一个粗暴而糊涂的西班牙贵族服务，担任其家务总管。第二个选段与卢梭有关，讲的是卢梭受到一个愚蠢而飞扬跋扈的贵族虐待的事，卢梭曾于1743年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一职。它出自卢梭的自传《忏悔录》。《忏悔录》于1765年写成，但直到1781年才得以出版。《费加罗的婚礼》与《忏悔录》同为18世纪80年代最引起轰动的作品，也是欧洲旧制度孕育出的最后一批文学杰作。到了1789年，这个旧制度就被法国大革命捣得粉碎。这两部作品很快就在法国遭禁，但其影响已然造成。³

18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构想新的秩序，鞭挞社会现状来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就拨动普通读者的心弦而言，没有哪部作品比得上前述的那两部。当局者很快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这两部作品深深触动了很多愤懑的年轻人。一开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很喜欢博马舍的那部喜剧，因为它嘲弄了贵族阶层，而彼时的路易十六正因贵族们顽固地保持独立、不愿归顺而深感沮丧。但他的顾问们很快向他指出，说到对权威的蔑视，费加罗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在维也纳，莫扎特根据博马舍原作改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很快被约瑟夫二世叫停了。约瑟夫二世虽自诩欧洲变革最大胆的君主，但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攻击贵族阶层的智商，这大大超出了他的忍耐极限，虽然他比路易十六更讨厌那些贵族们。博马舍清楚他喜剧里的嘲弄是针对整个贵族阶层的，而且这种嘲弄很危险，因为它是含有蔑视的讥笑，而非哭哭啼啼的发

牢骚。确实，博马舍的剧作早已成为“并非戏言”这一戏剧手法的经典之作。费加罗的猛烈挞伐中也含有自吹自擂的成分。这是一种建立在确凿事实之上的骄傲，它比任何形式的哭喊都要危险。比起人们对贵族享有特权这一不平等现象所发出的正义的愤慨，博马舍和卢梭所提出的思想更加危险：对那些当权者来说，他们大胆提出的社会构想远比人们对社会或经济上的不公正所怀有的义愤更具危险意味。这不是属于弱者的正当的义愤，而是那些一心想要成为新主人的人们的公然反抗。首先是费加罗，接着是卢梭，都敢于说他们的主子不但残酷无情，而且愚不可及。接着，他们宣称，他们这些“实干家”们才是更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拒绝服从愚蠢者。

博马舍的费加罗和卢梭清楚，他们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更能干，他们也瞧不起那些人。他们的目标不是解放这个世界，而是要出人头地，从而接管这个世界，然后消灭那些当权者，原因倒并不在于那些人不公正，而是因为他们是傻瓜。才干比高贵的出身更重要，然而那些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劳动群众和他们的主子一样愚蠢得无药可救。这个世界本该属于那些最勇敢和最杰出的人。史蒂文·英格伦曾把巴黎荣誉军人院那里的拿破仑陵墓所散发的气氛描述为：“它唤起的不是希望，而是对人类潜力（possibility）的敬畏感。”⁴它与正义的梦想无关，只是一个抓紧时机的问题。

这种敬畏感是要假以时日的，但这种潜意识——它不像希望、自由、平等或博爱那样虚无缥缈、富有利他主义精神，可是它早已在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和威尼斯大使馆中的卢梭身上萌发。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从来都不是理论家，所以他们不仅为新的政治文化赋予了新的自由语言，往往还付诸实践。他们是根据建立在自信心之上的利己主义行事的。利他主义精神在这些人身上一转即逝，但正如罗伯特·亚历山大在提及拿破仑时所说的，对他本人来说，“意志和才干是名声的根基”。⁵这两点是法国大革命本身最强大因素的根基，这种根基也造就了那一代获得自由的人们。雄心支配着拿破仑，而且它是自私自利的。正如拿破仑最早的支持者之一西鲍迪尤所指出的，他的天才只服务于他的

自负，他唯一热爱的是权力，他的情人是法兰西。⁶

然而，事实上，当他发迹时，他所有的忠实的追随者都与他一道发迹了。在拿破仑看来，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就是新的绝对真理。当“自由、平等、博爱”令一切分崩离析，并被提倡者们丢到脑后时，大革命当初的承诺——“事业的大门向人才敞开”依然保留了下来。当拿破仑说——有可能是真的——他在污水沟里找到了法兰西王冠，然后将它捡起来戴在头上时，他是在替费加罗和卢梭复仇雪耻。卢梭所能做的，如他自己所说，只有辞职归去，拿起笔杆子对社会进行口诛笔伐。确实，他接着又在《社会契约论》中虚构了一个政治乌托邦，写了两本伤感的畅销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这两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结论：卑躬屈膝才是“出路”。费加罗生活得更成功，因为他是虚构的人物。他愚弄了他的主人，并运用诡计使自己的心上人摆脱了他的主人的纠缠，但他以聪明的手段为自己和心爱的人设法获取的幸福完全是属于个人层面上的：“我以前又穷又遭人鄙视。后来我表露出智慧，又被人家嫉恨。如今，我有了一个漂亮女孩和一大笔财产！”⁷他完全可以为喜剧中设定的圆满结局欢呼雀跃了。对于像费加罗这类人，只有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将舞台场景变成现实。法国大革命促使了这类人在公共领域获得成功，拿破仑就是其典型代表。对这一类人来说，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一个理想，不如说是一个工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不知道如何驾驭它，就像那些被他们推翻的人不知道如何维持旧秩序一样，就有另一些人，他们“不得不利用知识和各种谋划以求生存”，这些人才能控制新的社会秩序。

假如说有一个词是拿破仑终其一生紧握不放的，那就是“命运”；而假如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那就是“雄心”。他将这两者带给了他那一代人及其后辈们，这些后辈们都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大革命所带来的解放——无论是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立法，还是得益于它无意中释放出的无比巨大的战争力量——都为胸怀远大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但正是拿破仑个人的雄心才将他们每个人的抱负变成了一种集体的命运意识。这个“命运”正是他本人为他那一代人做

出的个人贡献。

很多传记作家和史学家都着重强调拿破仑性格中愤世嫉俗和喜欢操纵人的这一面，他们说得没错。这些特征在他身上有着丰富的体现，如果说没有这些特征，他就能不随那个时代的消亡一同湮没，那就是脱离实际，甚至是荒谬的看法了，何况他还战胜了他的时代。然而，只强调他性格中的这一面，而罔顾其他方面，那就不仅歪曲了他这个人，也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取得那些有着持久影响力的巨大成就。正如安妮·卓丹所说，“拿破仑试图发现一切事物的积极面”。⁸当将这一点与他那非凡的精力放在一起看待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全面、更可信的人，毕竟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很久之后，拿破仑是欧洲人生活中的一股强大的创造性力量。也只有一个积极、充满乐观精神的人才能像拿破仑那样，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一心想要进行先进的改革。尽管一直处于战争的巨大压力之下，他的乐观倾向令他设想出新的现代司法体系、公共行政机构及教育制度；他的精力令他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将这些设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些体系和制度是他留给现世的鲜活遗产，当他的军事成就在他统治的末期被一扫而空之后，这些制度性遗产依然存在了很久。

本书作为拿破仑的传记，涵盖了拿破仑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1810年至1811年那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他又继续取得了更多成就。他所有关于旧制度结束后以及大革命之后的世界构想在他掌权时顿时变得清晰鲜活起来。首先是在意大利，随后是在法国，他迅速而明确地将构想付诸实践，这一特点是他内在固有的，因为他吸收了那个时代诸多的丰富思潮并重新加以表述。他之所以能学得如此之快、掌握得如此之多，是因为他对周围世界有一种永难被满足的好奇感。从年轻时起，拿破仑的笔记本中就填满了他从极为广泛的阅读中获得的事实和想法。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历史学家的承认：上一代受过教育的能够掌握所有本质性学问的西方人，恰好是拿破仑之前的那一代人。比如美国的杰弗逊和富兰克林，法国的伏尔泰，或者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们有幸成了这一群人当中的最后一批。拿破仑是在打一场必败之战，但

他不顾知识的急剧膨胀而努力赶超这些博学者，其努力之中体现出的英勇无畏，丝毫不亚于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他知道，他要学的有很多，而他的精力和好奇心促使他不断追求自我的完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已经超越了个人对知识的追求，拿破仑极为迅速地将知识变成了改革措施。这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能完成的。他心系未来，而不只是仅仅关心他的个人声誉，尽管他确实很在意个人名声。尽管拿破仑可能有变化无常、精神狂热的特性，但由他所催生的切实的改革措施早已被证明是持久的、可借鉴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空前的。

拿破仑的一生就是一个非凡的故事，那种充满无穷潜力的奇迹——足以让英格兰闻出透过他的陵墓散发出的威严——将呈现在故事的讲述中。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出身相对低微的人能企及他后来达到的高度。然而，更切中肯綮的是，没有哪一个这样的人后来成了他自己的主人，更不要说成为欧洲之主。从这一点来说，拿破仑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代，或者说属于当中最有活力的那些人。他们用双手扼住了法国大革命的咽喉，使之为他们效命。无论他去哪儿，他带着与他同时代的人一同前往。一开始，他与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只是有着同样躁动不安的雄心，并且都对旧制度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蔑视和鄙夷。但到了1805年，他率军向奥地利挺进时，他已无可争辩地成了这些人的首脑。法国大革命无意中为这一切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除拿破仑之外，没有人显露出那种独特的个人才能——能牢牢抓紧时机。革命者们恐惧这样的才能，而在那些年中，拿破仑经常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掩藏他的野心，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前车之鉴就摆在他们眼前。共和国革命的果实遭到出身贵族精英阶层的恺撒的窃取，当然，最终终结它的是屋大维。然而，人们即使翻遍整部古代史，也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和拿破仑相媲美之人。恺撒们都是贵族中的翘楚，拿破仑则是祖祖辈辈里诸多的“费加罗”其中的一个，目送着他们的旧主子们离开。因为他的成就是在充满危险、史无前例的动荡时代里取得的，所以显得更加宏伟。要想在这个世界里获胜，仅仅只靠充足的精力、敏锐的智力或巨大的野心是不够的。

许多了解拿破仑的人提到了他的自控力。有些人，比如朱诺夫人，将他的自控力视为一种美德；而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斯塔尔夫人，觉得这种自控力只不过是用以掩饰其自大、危险和虚伪的面具。不管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这种自控力是钢铁般的自我约束力的产物，须知拿破仑是一个情感强烈、经常充满狂热情绪的人，所以在他初入巴黎上流政治圈时，即在他1799年夺权前后的几个月中，他那“惊人的克制力”更令人印象深刻。⁹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往往知道如何在主人面前戴上面具，正如费加罗和卢梭所做的那样。拿破仑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危险重重的政治世界的领袖，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善于掩饰他在旧制度下养成的蔑视和自夸。拿破仑在其夺权过程中尽情地展示这一能力，但他向世人表露的自我克制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他的出身背景。谨慎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他出身于地中海小岛的特殊情况将他训练成了这样。这一特征不止一次地挽救了他，也促成了他的成功。约瑟夫·康拉德的杰作《诺斯托罗莫》中的主人公就像拿破仑一样，也出身于利古里亚地区，他来自一个以沉默正直而闻名的民族，与之同样闻名的还有他们的进取精神与深厚情怀。雄心和激情需要由自控力加以调和。康拉德对他小说中核心人物的看法——“人即使失去了平衡，他也能控制自己”¹⁰——既适合拿破仑，也适合小说中富有领袖魅力的吉奥瓦尼·巴第斯塔·菲旦扎。他们俩就像是来自同一个模子中造出来的一样。

没有人会比热尔曼娜·德·斯塔尔更恨拿破仑。她可能是她那个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也算是一位生来就享受着旧制度（ancien régime）特权的艺术爱好者。她是最早称拿破仑为权力狂的人之一，尽管她反复宣称拿破仑根本就是暴君。但即使不对这一断言做出强有力的反驳，它本身也几乎站不住脚。尽管如此，斯塔尔夫人的这一观点，就像拿破仑那举世闻名的目光一样犀利而准确。在拿破仑表面的镇静和威严背后，其实潜藏着极度的性急和勃发的精力。对斯塔尔夫人来说，拿破仑只是装出一副对知识非常好奇的模样，目的是哄骗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不断提到妥协和团结，而与此同时他在政治集团内又精心建起了支持他的队伍，他有本事令这些集团彼此争斗，

坐收渔翁之利。斯塔尔夫人的判断与拿破仑的经历形成了一个尖锐对比。要想对斯塔尔夫人的结论做一番评估，恐怕需要大量篇幅，但她抓住了他性格中的核心要素，这是无可置疑的。姑且不论拿破仑是否“口是心非”，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即使面对着无数把匕首也能镇定自若地讲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激情与谨慎之间平静地进行一场惊险的格斗，正是拿破仑性格的本质所在。

在拿破仑与斯塔尔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总是充满极为强烈的憎恶。尽管人们已经为了解释二人的不和而费了不少笔墨，但拿破仑对斯塔尔夫人的厌憎忍让值得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它超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对于这两位思想如此敏锐的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这种厌憎肯定不是像某些人毫无根据地宣称的那样，说什么拿破仑厌恶“知识女性”，这一点即使是像彼得·盖尔这样的大学者也未能免。¹¹ 他与继女奥坦丝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女性教育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他还给了两个妹妹巨大的权力——将托斯卡纳封给了埃莉萨，并把那不勒斯给了卡罗琳——这足以证明前一说法不实。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是以费加罗的眼光来看待斯塔尔夫人的：她是旧制度特权下的废品，是一位大权在握的部长兼财政家的女儿，还是一位年迈贵族的夫人，而她把丈夫当傻瓜来玩弄；不管她多么聪明，她只是一只寄生虫。对拿破仑来说，她是在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态度对待他这个新贵。就像费加罗的情形一样，与这样一个女人进行正面对抗可能会使人头昏脑涨，但拿破仑是个例外。

与其说拿破仑性格复杂，不如说他性格多面化。身处不同形势的他，精力充沛、富于想象、乐观而又愤世嫉俗；他野心勃勃，然而对所属的社会同样怀有无穷的憧憬。拿破仑与《荷马史诗》中“目光锐利”的奥德赛颇有相似之处。这两人都才思敏捷，观察力敏锐，善于说服人，并且无比冷酷，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胜利就是一切，并且他们都来自同一种社会文化——失败即毁灭。他们都身处一个空间极为有限的世界，无论是在独眼巨人的洞穴里，还是在革命时期巴黎的政治舞台上。做出这样一个跨越千年的类比并非是开玩笑。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奥德赛和拿破仑都是地中海岛民精英阶层的产物：他们各自的世

界尽管相隔千百年，却依然产生于同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并被这种环境所塑造；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贫困，但也激起了人们的雄心，但这种雄心唯有通过移居他乡才能实现，而战争常常推动了这一移民过程。拿破仑从文学作品中了解了古典历史，而古希腊罗马的世界，正是他那个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共同的文化货币，而在18世纪期间，随着世俗化取代了当时一直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基督教传统，这一文化货币的价值显著增长。然而，对于身为科西嘉中产阶级一员的拿破仑来说，古典历史是非常鲜活的，它为他提供了一个生活指南——因为驱使古代英雄的力量与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依然有关联；人们很容易在拿破仑的故乡——阿雅克肖城里发现类似于奥德赛那样的人。雄心支配着这块狭小而竞争激烈的小天地。这座贫瘠却生机勃勃的岛屿孕育出的每一代人，都会再次拾起古人的教诲，这些岛屿点缀着荷马所说的“葡萄酒色的大海”。拿破仑的雄心来得光明正大：它是祖辈的遗传。他是一代又一代坚韧不拔之辈的后裔，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是其先辈们共同的本质特点。他们的世界很狭小，但他家族的每一代人，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方面，从未中止或逃避提升家族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计划”，这一计划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这是拿破仑与生俱来的禀赋：雄心流淌在他的血管中。不管受到怎样的挫败、限制甚至粉碎，他的雄心从未减弱过。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激情，但它需要由精心谋算与狡猾加以调节。

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为这种古老的雄心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更为广阔的舞台背景，同时也带来了动荡多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谋划经常不得不让位于机会主义，谨小慎微让位于大胆冒险。拿破仑很快适应了这一世界，就在西方世界最危险、最变化无常的时代中，他展现了个人独有的天生能力——他能抓住出现在他身边的每一次机会。他过人的精力与智力、独一无二的才干，使他在普通人当中显得卓尔不群，天才就是集这些优点于一身的人。另外，激励他前进的雄心使拿破仑与那一代所有的法国人意见一致，这些人想要从大革命中为自己获得某种旧制度绝不允许的东西：只要有才华，